

#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压缩型”环境问题特征

李建新

1999年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重,相当多的地区环境污染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有的甚至还在加剧。中国的生态环境相当脆弱,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和草地功能衰退等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全世界都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充分认识我国环境问题的特征,理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

## 一、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恶化

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20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已进入世界前列,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工业化、城市化正在加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人均GDP由改革前的379元增加到1997年607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人均GDP增加了4—5倍。拥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正在逐步摆脱贫困,迈向小康社会。

然而,巨大的成就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恶化。环境恶化首先与工业化加快有关,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煤炭石油燃烧所产生的“三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统计数据表明,中国自80年代以来,大气污染物质排放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到90年代这种趋势仍在继续(见表1)。1998年我国酸雨问题仍然严重,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导致酸雨的覆盖面约占国土面积的30%。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也在90年代达到高峰,近两年才有所回落。1998年我国主要流域(水系)监测结果表明,劣五类水质高达38%,在监测的176条城市河段中,52%的河段污染较重,其中五类水质为16%,劣五类水质达36%。固体废物产生量居高不下<sup>①</sup>。

80年代以来,我国水土流失、耕地减少加剧,1998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但耕地减少量却比1997年有所增加。据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我国森林面积为1.3亿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3.92%。中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0.11公顷,只相当世界人均水平的17.2%,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森林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国虽是草地资源大国,但近年来,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和长期超载放牧,导致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质量逐渐下降。目前,我国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包括沙化、碱化)的草地达1.3亿公顷。同样,生物多样性也面临着森林砍伐、湿地开发、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和环境污染的威胁<sup>②</sup>。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世界正面临严峻环境问题前所未有的挑战。

表 1 中国历年废水、废气和废物总排放量(单位:万吨,亿标立方米)

年份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991	2358687	84653	58759
1993	2194919	93423	61708
1995	2218943	107478	64474
1996	2058881	111196	65897
1997	1883296	113378	65749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年鉴》1998

## 二、“压缩型”工业化与环境问题

“压缩型”工业化是与现代化理论有关、特别是与后进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有关的概念。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 D. O. Conner 称之为“压缩型工业化”(telescoping of industrialization)。D. O. Conner 在东亚环境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压缩型工业化”(telescoping of industrialization)的概念。他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因此工业化进程被大大压缩。压缩型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急剧转变的过程。二战以后,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急剧转变主要发生在后起之秀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 1965 年国内总产值中,工业部门产值的比重为 25%,1990 年已迅速上升到了 45%,农业部门同期则由 39%下降到 9%。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工业部门的比重由 1965 年的 29%上升到 1990 年的 43%,农业部门同期则由 27%急速下降到 5%。其他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也是如此。东亚这些国家以及中国的工业化,都是典型的压缩形态的工业化。在压缩型工业化过程中,环境问题也表现出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的形态,即多样性和复合性,既有与贫困落后相关联的环境破坏问题,也有伴随高收入、工业化而产生的如汽车公害、有毒化学物质、固体废弃物剧增等与高水准工业化相关联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虽然已达到了经合发展组织国家的中下水平,但是存在的下水道普及问题却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水平的环境问题。

亚洲发展银行环境专家 K. F. Jalal 在研究亚太地区贫困和环境问题的关系时指出,发展成员国家(DMCs)的环境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贫困和发展不足,二是来自发展本身。前者是由于贫困和人口压力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后者则是发展不当造成的。在 K. F. Jalal 的分析框架中,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明显地具有复合性。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和发展不足而产生的土地贫瘠化和自然资源枯竭,以及人类居住环境恶化如卫生用水等;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急速或发展不当而产生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环境问题,以及地球温暖化。过去那种不同国家不同的环境问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环境问题的绝对划分,已不适应于现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急速工业化国家。过去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的,是贫穷和人口压力类型的环境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认识显然过于简单。压缩型理论虽然还不成熟,但其分析思路与分析框架却是富有启发性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复合性和并发性。正因为有这些特征,才使后发展国家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日本学者平冈指出,压缩型发展迅速形成的产业化和消费社会,使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同时发生,致使政策层面上始料不及。如专业人员的短

缺,政府财政预算中环保的低投入,国民环境意识的低下,都将可能发生“对策的困难性”。这将导致工业化后发性的不利点有可能会扩大,具体表现为行政能力不足,产业公害发现迟缓,污染物质、污染源难以确定等各类问题。毫无疑问,运用压缩型理论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环境问题的认识,也有助于各类环境问题的解决。

### 三、中国“压缩型”环境问题的特征

中国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同样有着明显的压缩性特征。中国环境问题的压缩性表现在时空维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时间维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似乎并不短暂,但真正走向正规是在本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建国50年特别是后2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成了相对独立、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工业化。199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超过了3万亿元,第二产业的产值构成也由解放初期的20%成长为近50%,而同期第一产业则由50%下降到不足20%,主要工业产品进入了世界前列。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路程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在这50年中,前30年由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使中国工业化之路充满了曲折和艰难。真正的工业化是发生在后20年,因此中国的各种环境问题也集中地发生在后20年。传统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历时长,其相应的环境问题是阶段性逐步发生的,问题的解决也是逐步分阶段实现的。以日本为例,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开始开放门户,积极推进富国强兵实现工业化的国策。那时日本工业的基干产业是矿业、纺织业、钢铁制造业等三大产业,高耸矗立的烟囱和黑烟曾经是国家繁荣的象征。与此同时,和三大产业相关的环境公害也不断发生。这期间最严重、社会影响最大的是足尾铜矿有毒废水污染事件,被认为是日本公害的原点,这是日本工业化初期所出现的主要环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进入了战后恢复期和迅速增长期,在高速成长的50~60年代,产业公害也频频发生,其中最重大的公害是与化学工业有关的水银中毒事件(水俣病,新泻水俣病);与石油化工厂、发电厂排出二氧化硫有关的四日市的哮喘病;与铅矿精炼业排出有毒废水有关的富山县的痛痛病。70年代表现为规模开发型公害和生活公害,前者是由于大规模开发建设如新干线、机场、高速公路等引起的生态平衡遭破坏和噪音等问题,后者则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汽车尾气公害和城市垃圾等问题。80年代以后的环境问题则表现为地球温暖化和酸性雨等跨地域性的问题。今天虽然日本社会仍然存在和面临着一些过去公害的遗留问题及新的问题,如环境荷尔蒙等,但由于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从而给处理和解决环境公害打下了基础。

反观中国的情况则大不一样。中国压缩型的工业化并没有挤走或缩小中国的环境问题,而是该出现的环境问题一个不少地急速丛生。这里面既有与农业产业相关的,由于贫困和人口压力造成的过度放牧、过度砍伐使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如1998年我国耕地减少量比1997年仍有所增加,草地由于掠夺式开发和滥垦,面积逐年缩小,质量逐年下降,森林砍伐也屡禁不止,1998年中国长江特大洪水的原因之一,就被认为是由于长江上游的森林遭到了严重破坏所致;也有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中经济畸形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最为典型的是一些乡镇企业以其落后的技术装备,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环境效益,严重污染环境的“十五小”企业遍地开花,使一些地区环境公害、污染事件频频发生。据国家环保局的调查,“八五”期间乡镇工业排污量迅速增长,1995年全国乡镇工业废水排放量比1989年增加了121%,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21%;1995年乡镇工业粉尘排放量比1989年增加了

182%，占当年全国工业总量的67%；1995年全国乡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比1985年增加了552%，占当年全国工业排放总量的89%<sup>③</sup>。最后，相对发达的大都市由于生活消费方式的急剧改变，产生了富裕社会的环境问题，如浪费性消费、汽车尾气公害、大气污染和垃圾污染等问题。我国人均收入最高、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近几年在城市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上居全国前列。1998年全国因大气污染导致酸雨的覆盖面积约占地面积的30%，沿海部分城市酸雨出现频率呈上升趋势。过去发达国家在上百年时间里分阶段出现的不同的环境问题，今天在中国则是同一个时期多样并发出现。时间维上的“压缩型”工业化，带来了“压缩型”环境问题，使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多样而复杂的环境问题感到压力沉重。

其次，环境问题的压缩性表现在空间维上。考察一下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现代化都不难发现，在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都有极为不光彩的一页，即当本国本地区的资源、能源出现危机时，便进行殖民扩张。早期欧洲各国对非洲、亚洲殖民地资源的肆意掠夺，美国对印第安原居住地的破坏和扩张，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掠夺，实际上都是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的历史。20世纪后半叶，虽然没有世界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那样掠夺殖民地资源的战争硝烟，但却不乏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公害输出和环境危机转嫁的例证。日本环境学者石弘之研究指出，公害输出有三种模式：(1)危险物、有害物的输出；(2)作为公害源的工厂或生产工艺的输出；(3)为本国需要，在其他国家、区域开发资源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对安全、卫生和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少发达国家将许多环境污染大的工厂和环境破坏行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984年印度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毒气外泄事故，造成了5000人死亡，数万人中毒，其肇事者是美国一家跨国公司，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害输出的例证。日本也在7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以后将那些环境污染严重，国内难以生存的传统工业如钢铁、有色金属部门和化学工业等迁移到海外，尤其是亚洲地区。亚洲许多国家如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都曾是日本公害输出的受害国，中国也同样是公害输出的受害国，如前些年的洋垃圾事件。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当本地的资源、能源短缺的时候，就拓展其他空间，在殖民地掠夺和扩张；当环境污染和公害出现并危害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时候，就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从而转嫁本国的资源和环境危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环境压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道义上讲，都不可能存在这种掠夺和转嫁的“优势”，相反存在着许多制约，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先行的发达国家占据或破坏了。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世界各国对日益严重的地球温暖化十分关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责任和义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中国代表坚决反对给发展中国家增加新的义务。虽然中国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很低，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日本的1/4，美国的1/8，但总量在世界上是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位，因此倍受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关注。因为，如果地球大气层容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有限的的话，那么，已经占据相当份额的发达国家当然会十分担心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大的排放量，特别是发展迅速的人口大国中国。因此，在只有一个有限地球的今天，中国不得不面对着狭小的生存空间，谨慎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环境资源问题的空间压缩性也越来越明显。据报道，中国正在加紧行政区域的勘界工作，因为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资源的压力，利益的驱动，以争夺资源为主要内容的边界纠纷连绵不断，呈大幅上升趋势<sup>④</sup>。由此可见，中国别无选择地面临着

自身严峻的“压缩型”环境问题。

既然我国的环境问题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那么首先就应当明确,中国的环境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今天我们较之于发达国家不仅面对着贫困和经济落后,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更需要发展。当现代化进程中因经济发展带来各种环境问题的時候,当严重的环境问题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发展和不发展的問題,而是如何进行发展的問題。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由于“压缩型”工业化所带来的“压缩型”环境问题与传统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只能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之上,探求自身的解决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将更艰巨更困难更具有挑战性。中国政府从70年代初期第一次全国环境大会以来,就开始重视全国的环境问题。1992年世界里约环境发展大会之后,中国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又出台了《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在环境治理投入上不断加大力度。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对我国“压缩型”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具体操作部门对环境政策法规的严格贯彻和实施,有赖于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的内化,有赖于民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探索寻求一条能够摆脱传统发展模式、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道路,是我国实现新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

①②《中国环境报》,1999年6月17日。

③《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年鉴社1998版。

④《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1月22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许宏海)

(上接第57页)理性和事实为依据。现实的情况是,当社会改革的措施有利于自己时,某人拥护改革;而当改革措施触及自身利益时,则可能大呼改革“搞糟了”。自利性态度也具有普遍性,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它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不把握这一点,态度分析往往就会无所适从。

能否这样断言:个体的所有需要都表现为自利性需要?当然不能。可以说,任何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程度的利他性需要,这是人们的社会适应性所决定的,也是个体社会化所必需的。区别在于,这种利他性需要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其中,也有层次高低之分。但是,自利性需要毕

竟是有特别意义的。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当某一社会成员评价事物的核心标准是其社会价值时,同时,这种态度并未停留在顺从、服从、同化阶段,而是进入了内化阶段时,利他性需要也可以表现为自利性需要,主要表现为维护固有观念的需要,一种自我的心理需要。事实证明,人类社会并不乏这样的杰出人物。

注:

①北京图书馆编《社会学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4页。

②列宁《哲学笔记》,求实出版社出版,第131页。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许宏海)